

区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陈希慧, 钟佳雯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 浙江 衢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3日

摘要

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语境下, 如何跨越城乡二元要素阻隔、重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已成为当前区域治理与教育学界关注的核心命题。作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联结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 区域职业教育正在从边缘性的劳动力培训向系统性的“空间重构”与“资源整合”角色转变。本文首先阐释了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 将其解构为人才引流与资本活化的要素耦合逻辑、社会空间重构与多元共生的治理逻辑以及数字技术整合与多维转向的时代逻辑。进言之, 结合当前实践, 深入剖析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中所面临的专业对接“解耦”、协同动力不足、数字化转型滞后等深层瓶颈。在此基础上, 立足于浙江省衢州市“四省通衢”的生态底色与县域经济特征, 系统总结了衢州在探索产教协同、培育乡村“新质人才”与“创业青年”等方面的生态化演进路径。最后, 从精准定位产业对接网络、重构“一体两翼-开放共享”的数字平台、完善“共生协同-长效评价”的制度机制三个维度, 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与前瞻性的衢州实践重塑路径, 以期为区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度融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

职业教育, 乡村振兴, 空间重构, 共生理论, 衢州路径, 人才培养

Research on the Inner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Empowering All-Round Rural Revitalization

Xihui Chen, Jiawen Zhong

Schoo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Quz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Qu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ne 24, 2026; accepted: August 5, 2026; published: August 13, 2026

文章引用: 陈希慧, 钟佳雯. 区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J].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8): 223-233. DOI: 10.12677/ve.2026.158334

Abstract

Under the strategic context of all-rou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to cross the barrier of urban-rural dual factors and reshap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rural areas has become a core proposition of common concern in current regional governance and educational circles. As the educational type most closely linked with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hanging from marginal labor training to systematic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inner logic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mpowering all-round rural revitalization, deconstructing it into the factor coupling logic of talent diversion and capital activation,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soci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symbiosis, and the era logic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Furthermore, combined with current practices, it deeply analyzes the deep-seated bottlenecks faced b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uch as the “decoupling” of professional docking, insufficient synergistic power, and lagg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is basis,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oroughfare of four provinc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y economy in Q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it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Quzhou’s ecological evolution path in exploring industry-education coordination, cultivating rural “new-quality talents” and “entrepreneurial youth”. Finally,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precisely positioning the industrial docking network, reconstructing the “one body and two wings-open and sharing” digital platform, and improving the “symbiotic synergy-long-term evaluatio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it proposes operable and forward-looking paths for Quzhou’s practical remodeling,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radigm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ll-rou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Symbiosis Theory, Quzhou Path, Talent Cultiv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重心的历史性推移,乡村全面振兴已成为重塑城乡空间秩序、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引擎。在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人才匮乏、要素流失以及产业结构单一等结构性问题,依然是制约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深层顽疾。如何破除城乡二元要素阻隔,激发乡村本土的内生发展动能,成为各级政府与学界共同面对的重要命题。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旨在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教育类型,在优化劳动力配置、促进产业技术升级以及服务地方社会治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天然优势。当前,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技培训”或单纯的“劳动力输出”,而是向着更深层次的“空间重构”与“资源整合”迈进,成为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重构乡村生产生活空间的核心纽带。

从区域实践的视角来看,浙江省衢州市地处钱塘江源头,作为闽浙赣皖四省边际的交通枢纽与生态屏障,其乡村发展既承载着生态保护的刚性约束,又面临着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诉求。如何利用区域内的职业教育资源,赋能柯城、衢江、龙游、江山、常山、开化等不同县域的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农

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是衢州实现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的关键。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的耦合深度不足、社会资源的协同动能欠缺、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进程不均等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赋能效能的充分释放。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将共生理论、空间重构理论以及多维协同治理理论引入职业教育学解释学,在厘清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我国区域职业教育面临的深层困境,并立足于衢州的本土化实践,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重塑与路径优化方案,以期在算法时代和知识经济浪潮下的乡村振兴贡献富有韧性的基层治理经验。

2.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

2.1. 人才引流与资本活化的要素耦合逻辑

1) 职业教育作为人才振兴突破口的资源集聚效应

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在于人才的集聚与活化,而职业教育凭借其横跨教育界与产业界的独特属性,必然成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突破口[1][2]。从生产要素的流动规律来看,传统乡村社会的衰落往往伴随着智力资本与劳动力资源的单向净流出,而职业教育能够通过定向培养、在职进修以及社会化培训等多样化路径,在城乡之间建构起一条人才回流与本地留存的“双向管道”。这种资源集聚效应不仅体现在源源不断地向乡村输送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3],更体现在其对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资本的无形重塑。职业院校通过在乡村设立实训基地、技术驿站和校企合作项目,能够将现代工业文明、商业逻辑与数字化思维引入闭塞的乡土空间,使原本处于闲置或低效状态的乡村土地、生态、文化资源与现代金融资本、技术资本发生深度化学反应,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乡村“要素盆地”的弱势地位,实现乡村人本资本的整体增值与内生性成长。

2) 新质人才培养与县域特色产业转型的精准对接

在经济高质量转型与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乡村产业也在经历从传统粗放型农业向数字化精细农业、乡村文旅演艺、现代跨境电商等多维新业态的剧烈跃迁,这在客观上对乡村劳动力结构提出了新质化的时代要求[4]。职业教育赋能县域经济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将专业设置、教学内容与乡村产业链精准对接的弹性机制[5]。新质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硬技能,更要求其具备数字化生存能力、绿色发展理念和跨界融合的软实力。职业学校通过动态调整专业图谱,开设数字农业、冷链物流、生态文旅、乡村规划助理等极具地方针对性的新兴专业,能够使教育产出与县域特色产业的技术需求达成高度的结构性耦合,避免传统“黑板种田”式的脱节弊端,从而通过劳动力红利向技能红利、智能红利的跨越式升级,直接驱动乡村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2.2. 社会空间重构与多元共生的治理逻辑

1) 空间重构视域下职业教育治理机制的重塑

空间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地理容器,更是社会关系、权力博弈与要素流动的具体表征。从空间重构与资源整合的视角出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质,就是要在空间维度上对原有的城乡失衡格局、学校与社区的隔离状态进行全方位的社会学重组[6]。在传统的治理框架下,职业学校往往是一个封闭的学术和技能训练场域,与广阔的乡村社区和乡土产业之间存在着无形的壁垒。通过空间重构,职业院校应当将自身的教育边界向乡村场域无限延伸,通过“校总院分”布局、共建田间学校、移动实训车间等方式,将优质教育资源直接嵌套进乡村的生产和生活物理空间。这种空间的实质性重组,能够打破物理与制度的双重壁垒,推动资金、信息、技术在城乡空间内的自由交融与高效配置,从而将学校单一的教育功能转化为集人才培养、技术孵化、文化引领与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治理机制”。

2) 共生理论下职业学校与乡村社区的命运共同体构建

根据共生理论的解释路径, 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之间绝非单向度的扶持或依附关系, 而是属于一种典型的、在特定社会生态系统中互利共存、共同演进的“多元共生”命运共同体[7]。在这个共生系统中, 职业学校是提供智力支持、技术研发和规范化管理的“共生质”, 乡村社区与特色产业则是承载教育实践、验证技术价值和吸收劳动成果的“共生基”, 而两者之间的互动规则、信息反馈与利益分配方式则构成了“共生界面”。如果职业教育脱离乡村实际而追求盲目扩张, 或者乡村发展忽视职业技能支撑而走粗放老路, 都会导致共生系统的破裂。因此, 在共生视域下, 必须通过契约化合作、利益共享机制的创设, 推动两者的良性互动由初期的“偏利共生”(单向索取或单向帮扶)向高级阶段的“互惠共生”(学校因服务地方而获得办学活力, 乡村因学校注入而实现全面振兴)升级, 形成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文化共荣的区域发展新生态。

2.3. 数字技术整合与多维转向的时代逻辑

1) 数字化转型赋能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意蕴

在信息技术与智能大模型全面重塑社会生产生活范式的算法时代,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农村职业教育变轨超车、助推乡村振兴的战略性制度选择[8]。传统农村职业教育由于地理偏远、师资流失、实训设备陈旧, 长期处于整体教育生态的边缘。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入, 凭借其跨越时空的即时性、无限复制的低边际成本以及强交互性, 彻底打破了城乡职业教育在物理和地理空间上的鸿沟。通过开发基于混合现实(MR)的虚拟仿真农技实训系统、搭建云端终身学习管理平台、引入智能 AI 教辅系统, 农村职业教育能够实现教学资源的即时下沉和个性化精准推送。这不仅极大提升了农业技能培训的可及性与实效性, 更能赋能偏远山区的技术农民与创业个体, 帮助其低成本地接入全球化数字商业网络, 从而在技术工具理性层面为乡村社会跨越信息壁垒、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底层技术支撑。

2) 数字经济时代“一体两翼”开放教育的路径转向

在数字经济浪潮的推动下,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必须跳出传统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单一路径, 转向“一体两翼”深度融合的开放式新型教育生态[9]。所谓“一体两翼”, 是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主体, 以数字化开放教育和乡村社区终身教育为两翼, 依托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化手段, 构建起一个随时、随地、随需的学习型乡村格局。在具体产业对接中, 特别需要针对新商科职业教育进行战略转型, 重点向数字营销、智慧物流、乡村微金融等方向延伸[10]。通过开放式职业教育平台的建设, 不仅能够让在校学生接受到前沿的产业实践训练, 更能够为乡村庞大的在职农民、返乡创业人员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知识更新与技能迭代服务。这种由传统“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制开放赋能”的转向, 能够最大限度地激活乡村社会的能动性, 使每一位村民都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乡村产业发展的微观创新源泉。

3. 区域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审视与困境剖析

3.1. 结构性脱节与供需失衡的现实困境

1) 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解耦

尽管诸多地方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向乡村延伸, 但在微观实践中, 职业学校的专业结构设置与乡村产业快速更迭、新业态蓬勃兴起的技术需求之间仍存在着显著的“解耦”现象。当前许多涉农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依然带有浓厚的老工业时代印记, 学科划分过细、内容单一, 且大多偏重于传统的作物种植和畜牧养殖, 严重缺乏对现代数字农业、生态文旅融合、乡村康养产业、智慧农业装备维护等复合型、前沿型产业要素的主动吸收。这种供给侧的结构性僵化, 导致了极其尴尬的双重困境: 一方面, 大量涉农专业毕业生由于所学技能无法适应现代乡村的高端化、多元化岗位需求, 选择彻底脱离乡村流向城市[11]; 另一方面, 乡村合作社、农业科技型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 在面对数字化、网络化转型时, 却面临着千金

难求“数字新农人”、“乡村微创客”的深度人才荒,这种人才供需的结构性错配极大削弱了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社会的能力。

2) 农村创业青年培育及长效支持机制的缺位

农村创业青年作为最具创新活力与示范效应的乡村群体,其长效培育机制的构建,直接决定着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然而,剖析现有的培育模式可以发现,多数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对于返乡青年和本土创业者的教育支持,仍停留在粗放式的“短期速成班”或“一次性技能扫盲”阶段,严重缺乏全周期的成长规划与持续跟踪服务。创业青年在结束培训后面临的往往不是技术缺乏,而是缺乏起步资金、缺乏稳定的供应链对接、不懂得品牌运作、缺乏法律咨询与风险防控机制等一系列系统性痛点。这种“重培训、轻孵化,重灌输、轻生态”的教育断层,导致许多创业青年在缺乏后续智力和资源支撑的环境中单打独斗,创业成功率极低。职业教育尚未能真正将技术培训与创业孵化器、产学研协同平台有机集成,无法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持续的营养输送和抗风险赋能,导致“培训时热热闹闹,创业时冷冷清清”的机制性疲态。

3.2. 体制机制壁垒与协同动力不足的深度治理瓶颈

1) 产教融合深度不足与体制机制创新滞后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但在服务地方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这一机制由于体制机制创新的滞后,面临着明显的“表面化”和“浅表层互动”问题。许多地方建立的乡村产教联盟或校企合作基地,往往沦为剪裁挂牌、新闻宣传的道具,缺乏深层实质性的产学研业务耦合。在当前的民商法与行政法框架下,职业院校作为事业单位,其资产处置权、技术转让收益分配权以及教师兼职取酬制度等仍受到诸多体制性约束,导致教师和科研人员缺乏将先进农技成果在乡村一线进行产业转化的核心内生动力;而对于广大的民营乡村企业和农业合作社而言,参与产教融合需要付出高昂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在缺乏强有力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实质性制度红利的前提下,其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严重受挫。这种局面导致职业教育赋能的资源通道被严重阻断,极需通过深水区的体制机制创新和系统化的成效评价体系建设来予以破局^[12]。

2) 治理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尚未健全

在后扶贫时代,防范返贫与治理相对贫困已成为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的底线任务,而职业教育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有效工具,其相对贫困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制度保障仍亟待完善。在微观治理实践中,针对低收入农户、边缘易致贫群体的精准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依然面临着“靶向不精准”、“培训质量偏低”和“就业稳定性较差”的重重阻碍。部分培训流于形式,未能充分结合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劳动力状况、认知基础和物理半径,导致其所学技能无法转化为在县域工业园或现代乡村产业链上的稳定就业机会。同时,职业教育、民政帮扶与产业扶持政策之间的协同机制不畅,信息共享存在壁垒,导致教育红利难以精准折射到最贫困、最急需的农户身上,这种治贫长效机制的缺位,在客观上削弱了职业教育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城乡均衡协调发展方面的兜底性保障效能。

3.3. 要素割裂与外部支撑弱化的多维制约

1) 思想政治教育引领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融合深度不够

乡村全面振兴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累积和产业产值的增长,更是涵盖乡村文化复兴、乡风文明建设和精神面貌重塑的整体社会工程,而在这一宏大命题中,思政教育本应担当职业教育赋能乡村的核心支撑与内生驱动力。然而,审视当前的职业院校思政教学体系,可以发现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语境存在着显著的物理割裂。思政课堂往往局限于高墙内的理论说教,未能将博大精深、质朴温润的乡土非遗文

化有机融入教学设计。这导致许多职业院校学生缺乏对乡土价值的理性认同和深层的情感归属,“嫌农、离农、叛农”的职业心理偏差依然广泛存在。思政教育驱动不力、文化引领缺位,使职业教育在赋能乡村的过程中缺乏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文化凝聚力,无法在根本上激发青年技术人才自愿扎根基层、奉献乡村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

2) 国际化视野拓展与地方特色产业协同的路径狭窄

在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并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已成为提升办学品质和地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但这一国际化视野在赋能乡村振兴的实操中却面临着路径狭窄、合作脱节的尴尬现实^[13]。多数职业院校的国际化合作项目高度集中于城市的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鲜有将目光投向涉农产业、地方特色手工业以及乡村生态旅游的全球化推介上。这导致地方具有鲜明地缘特色的优势农业产品(如特种绿茶、富硒农产品、非遗竹木编织等),因为缺乏懂得国际贸易规则、跨境电商运营、国际绿色物流和跨文化传播的职业技术人才,长期被局限在低层级的国内本土销售市场,难以走向国际高端绿色消费市场。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与乡村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严重脱离,使得广大农村地区无法充分享受开放发展的要素溢出效应,极大地限制了乡村产业生态位的高阶跃迁。

4.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重塑与机制构建

4.1. 共生理论视角下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

1) 明确共生单元的权责边界与协同机制

在共生理论的科学框架内,要确保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系统稳定、高效运转,首要任务是必须精准界定系统内部各个共生单元的法律地位、权利边界与治理责任。政府、职业院校、涉农企业、社会培训组织以及村民农户,共同构成了这一共生系统的核心要素。政府作为系统的“生态维护者”,其权责应定位于战略规划、制度供给、专项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公共服务质量监测,坚决避免对职业学校自主办学和企业商业决策的行政微观干预。职业院校作为核心“智力供给者”,应当享有充分的课程设置、专业微调与科研成果转化分配自主权,并承担将技术送下乡、为地方培育新质劳动力、弘扬乡土先进文化的法定义务。涉农企业和合作社作为“产业实践载体”,在依法享受财税红利和产教融合专项激励的同时,应当深度履行共同开发课程、提供高质量实习岗位、参与学生学业评价等合作职责。通过在民法和行政法层面上厘清多元主体的权责边界,构建起各司其职、协同共进的法治化共生关系。

2) 畅通共生界面的要素流动与反馈渠道

共生界面的流动效率和信息对齐度,直接决定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生命力。在系统运行中,必须打破行政壁垒和信息孤岛,建立起一条畅通无阻的要素流转与价值交换通道。这就要求由地方政府牵头,依托现代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建立“区域乡村产教融合数字协同平台”。该平台能够实时向社会发布县域内各乡村产业链的技术更新需求、用工紧缺状况、创业项目孵化痛点,以及各职业院校的专业师资力量、科研成果清单、实训室闲置状况。同时,建立常态化的“政校企村”联席会议制度与多方需求快速反馈机制。当乡村产业链上出现突发的技术瓶颈或新型用工荒时(例如突发农业病虫害或直播带货爆单),系统能够迅速启动响应,由职业学校组建专家科研突击队或紧急调整教学模块,将课堂与实训即时推移到田间地头和物流前线,实现供需之间毫秒级的信息对称与资源对齐。

4.2. “一体两翼”架构下的资源整合与空间重构路径

1) 建设以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合”为特征的空间治理模型

为打破城乡要素阻隔与物理隔绝,“一体两翼”的构建必须落脚于新型的空间重构实践,即在县域层面上大力推行职业学校校区、产业园区和乡村社区“三区融合”的空间治理模型。在这种新型空间布局中,职

业学校的校区不应再是一个孤立的地理板块,而是应当主动融入甚至嵌套在当地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特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内。校企共建的实训大楼既是学生的实训场,也是乡村企业的技术研发中心和员工培训基地。同时,将乡村社区转化为职业教育的天然延伸空间,在村落集聚区和乡镇综合服务中心设立“社区职业教育微课堂”、“乡村终身学习驿站”,由职业院校定期选派骨干教师下沉,在最贴近农民日常生活半径的物理空间内,开展技能培训和文化生活熏陶。这种物理与社会空间的多维交融,能够将割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教育空间缝合成为一个有机的要素网络,实现社会资源的最大化共享与高价值流转。

2) 推动全日制技能教育与数字化开放教育的组织重构

在完成空间地理缝合后,必须在组织管理和教学流程上进行深层次的结构重构。学校需要彻底打破单一、僵化的全日制三年制班级授课制,引入“学分银行”制度、模块化短课制和弹性学制。将原本庞大、漫长的教学大纲解构为数千个小微、独立的技能模块,并全部实现数字化上云。无论是全日制的在校学生,还是乡村社区的兼职农民、返乡创业青年,均可以通过移动终端,根据自身的实际生产和职业规划,自由选择课程进行系统性学习。农民在田间地头的生产实践经验、参与短期培训获得的结业证书,均可通过科学的评价体系转化为标准学分,并储存在区域“学分银行”个人账户中。当累积到法定额度时,即可申请颁发相应层次的职业资格证书或大专、本科学历证书。这种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开放式培训在底层组织逻辑上的无缝贯通,能够极大释放教育制度的包容性,真正让职业教育融入乡村终身学习型社会的构建。

4.3. “政产学研用”多维联动的精准对接机制

1) 创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校企协同“科研-产业”孵化器

为破解科研成果“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而无法切实造福乡村产业的顽疾,必须依托“政产学研用”多维联动机制,创设由政府主导扶持、职业院校研发主导、涉农龙头企业运营、乡村农户深度参与的“科研-产业”一体化孵化器。孵化器重点围绕县域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环保农业技术、乡村智慧文旅等领域,设立专项研发课题。课题的立项必须由乡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根据田间地头的真实痛点(如农产品储运保鲜技术、农机智能化改造等)进行出题,由职业学校的“双师型”骨干教师带领优秀学生进行揭榜挂帅研发。研发成果在孵化器内直接进行中试和商业化包装,并通过校企合股、技术入股等知识产权激励方式,快速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商业实体。这不仅能让学生在真实的商业竞争中磨砺顶级技能,更能源源不断地为乡村实体经济输入具有自主产权的科技活水。

2) 构建校企共建、校地共管的利益共享约束机制

在“政产学研用”的多维螺旋上升过程中,必须构建起一套科学、规范的法治化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机制,以维持各方合作的长效稳定性。各合作主体应当通过签署正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产教融合多方合作宪章”或“合伙协议”,依法设立独立的第三方运营实体。明确规定技术研发成果所产生的全部经济效益、无形资产使用权在政府公共基金、职业院校、科研团队、产业投资方以及参与实验的农户之间的精确分配比例。坚决杜绝“学校利用企业套取国家专项资金”或“企业将学校视为免费廉价劳动力提供方”的短期投机行为。同时,建立透明的合规审计、教学质量监督和违约救济机制。通过让多方主体在法治轨道的保障下,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实质性利益纽带,从而在制度根基处彻底激活“产教融合服务乡村”的无限动能。

5.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衢州路径探索与制度重塑

5.1. 衢州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生态化演进

1) 具有衢州特色的“两山”转化与产教融合布局

衢州作为钱塘江流域的生态高地,其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落地,必须以绿色低碳循环、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为根本遵循。在这一硬性约束下, 衢州的职业院校在服务乡村的过程中, 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产教融合布局”。以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衢州科技职业学院等区域内骨干院校为领头羊, 精准对接衢州各县市的生态主导产业。在开化、常山等生态保育和绿色农业县, 重点布局生态养殖技术、美丽乡村设计、林下经济开发等绿色涉农专业; 在江山、龙游等工业底蕴较强的县域, 则侧重于智能农业装备制造、绿色包装材料、电商物流等支撑性产业的产教融合。通过将专业群建设在绿水青山之间, 职业教育不仅成为了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资产跨越转型的强力催化剂, 更是从根本上实现了教育办学品质与生态环境保护、区域经济转型的绿色生态化共生演进。

2) 多维转向、问题审思与未来图景的区域探索

在推进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 衢州各级政府和职业学校主动进行了多维转向的制度探索, 积极审思在要素配置和体制机制层面的深层积弊, 绘就了一幅极具生命力的未来治理图景。衢州打破了过去教育部门单一管理职业学校的行政壁垒, 由市委、市政府统一牵头, 成立了“衢州市产教融合服务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 将教育、农业农村、财政、人社等多个核心部门的行政资源、资金池和政策包进行系统性归并。同时, 重点针对衢州辖区内的偏远高山村落、库区移民村等相对困难群体, 定向开展了“学徒制精准农技帮扶工程”和“乡村微创客扶持计划”。这种多维转向的制度探索, 标志着衢州的职业教育正在告别传统、割裂的劳务技能输出, 全面转型为一种由市域统筹、深度融入区域生态链和产业链的高质量社会治理闭环, 为中西部山区和生态敏感区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区域范式。

5.2. 空间重构, 推行“一体两翼 - 开放共享”的数字平台

1) 构建“数字职教”赋能网络, 打破城乡物理边界

针对衢州“一市六县”中多山区、半山区的地理空间阻隔, 衢州必须下大力气在数字空间维度重塑职业教育的输送和交互机制, 构建起一套覆盖全市、即时共享的“数字职教”赋能网络[14]。衢州应由市教育局与本地科技企业合作, 利用 5G、超高清视频流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 搭建统一的“三衢乡村数字职业教育公共云平台”。该平台将衢州职业技术学院等核心院校的优质课程资源进行全面的数字化重组, 并向全市所有乡村社区、现代农业合作社进行无障碍免费开放。同时, 在常山胡柚基地、江山蜜蜂养殖区、开化龙顶茶园等核心特色农业产业带的物理现场, 安装高精度的物联网监测设备与超高清实时双向教学摄像系统, 建立“云上田野实训室”。学生和农户通过手机或 VR 终端, 即可随时切入田间真实的生产实操画面, 在远程高级农艺师的即时在线指导下开展精准剪枝、病虫害识别与智能灌溉控制。这种以数字技术实现教学资源的即时、精准、无阻碍沉降, 彻底打破了空间地理对山区教育公平与技术传播的残酷限制, 极大降低了农民获取先进职业技能的门槛。

2) 引入开放式教育资源, 打造乡村终身学习空间

为让数字化赋能不仅服务于在校教育, 更能转化为推动全社会共同进步、提升农民整体素养的终身动力, 衢州应当将数字化开放教育资源全面下沉、嵌套进“美丽乡村”和“未来乡村”的物理空间建设之中[15]。衢州应在全市数千个乡村综合服务体, 统一建设“数智开放学习吧”与“终身学习数字驿站”。驿站配置交互式大屏、自助式虚拟仿真职业技能训练仪等硬件设备。通过与“学分银行”系统进行底层数据互通, 为全市乡村居民建立统一、唯一的“三衢市民终身学习个人账户”。村民无论是到驿站观看一堂农业电商直播课, 还是参与一次由学校送教下乡的非遗工艺现场实操, 其行为数据和学时学分都将通过区块链技术被安全、真实地记录在数字账户中。当累积到一定额度时, 可以在平台上兑换免费技能考核证书、政府创业专项贴息贷款授信额度, 或者在乡村“微治理积分超市”中兑换生活物资。通过这种数字化和制度化的创新设计, 将冰冷的数字技术升华为具有强烈人文关怀和强力制度激励的乡村终身学习空间。

5.3. 精准定位, 构建“产教融合 - 产业赋能”的对接网络

1) 优化专业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 培育乡村“新质人才”与“创业青年”

在产业融合日新月异的背景下, 衢州职业院校必须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上进行大刀阔斧的靶向供给侧改革, 实现专业链对产业链的精准、高阶对齐。具体而言, 针对柯城的现代柑橘(椪柑、红美人)和农业电商产业, 重点开设“数字农业技术”、“农产品跨境电商运营”、“智慧农业物流”等新商科专业; 针对龙游的造纸传统、江山的木门与消防器材制造业, 重点推进“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应用”、“工业设计”等工科专业群的产教深度融合¹。在培养手段上, 学校应当改变传统的“课堂、书本、教师”老三样, 联合衢州市农业农村局共同实施“三衢乡村创业青年‘星火计划’”。每年遴选数百名具有返乡创业强烈意愿的青年、大学生、专业合作社带头人, 推行校内导师、创业导师、产业导师“三导师”联合指导机制, 在校内为其设立“创业实验班”和“商业孵化岛”。学生带着家乡的实际产品和项目痛点入学, 在校期间完成项目书撰写、供应链对接、直播账号孵化等全套实战操作, 使其毕业即能回乡创办具有高度商业可行性的“微实体”和“新企业”, 培育一批懂技术、会讲故事、善于把青山绿水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乡村“新质青年创业者”。

2) 创新新商科职业教育与电商物流特色产业链的深度耦合

作为“四省通衢”和国家级物流枢纽的重要节点, 衢州近年来在农村电商、云客服、数字仓储配送等数字商贸服务业方面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 这为新商科职业教育的转型升级和精准赋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产业土壤[16]。衢州各大职业学校应当乘势而上, 打破传统商科单一理论讲授的陈旧模式, 与阿里巴巴、京东、顺丰等头部数字企业深度合作, 在校内组建“三衢数字产教融合新商学院”。新商科各专业应当全面引入“实战进课堂, 课堂进商区”的深度教学改革。将企业真实的直播电商带货项目、跨境网店客服、数字仓储精细化配送调度任务, 直接转化为学生的专业核心课程和期末考评指标。在教学实施过程中, 学校与各县、乡、村的三级现代物流快递配送体系、村级直播间进行深度空间重构和资源整合。让学生直接担纲乡村农特产品(如开化龙顶茶、常山胡柚、衢江莲子)的数字营销总监、供应链优化师和跨境主播, 在源源不断地为乡村实体产业带来庞大线上流量和销售业绩的同时, 也在真实的产业前线锤炼出了无缝对接市场的高精尖实战技能, 实现新商科职业教育与地方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度耦合与双向奔赴。

5.4. 治理赋能, 完善“共生协同 - 长效评价”的制度机制

1) 构建多主体共生共赢的教育治理评价体系

为确保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这一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能够长期在法治和科学轨道上健康、稳定地运行, 衢州必须系统重构现有的职业教育质量考评机制, 建立起一套涵盖多主体、多维度、多阶段的“乡村振兴服务质量共生评价体系”。传统的职业教育考评标准高度偏向于校内学术指标, 如论文发表数、科研立项数、学生在校竞赛获奖等, 这严重偏离了服务地方经济的办学初心。新型的共生评价体系, 应当由衢州市政府督导室作为独立第三方牵头, 联合农业农村局、乡村合作社协会、龙头企业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评价委员会。将职业学校专业群服务衢州县域特色产业的贡献度、技术研发成果在乡村的实际转化产值、年培训技术农民和返乡创业青年的稳定就业创业率、以及服务相对困难群体的满意度等“大地指标”, 作为决定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评级、学科经费划拨、骨干专业认定以及教师职称晋升、绩效分配的硬约束考核指标。通过考核评判“指挥棒”的彻底重构, 强制引导学校的智力、财力、精力资源向乡村一线全面下沉。

¹<http://dianda.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203192293>

2) 完善精准帮扶与贫困治理的教育长效阻断机制

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规模返贫的底线要求下, 衢州的职业教育必须进一步完善其精准帮扶、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阻断机制。衢州市人社局、民政局与各职业院校应当建立“三衢相对困难家庭技术赋能协同数据库”。通过对全市低收入农户、边缘易致贫户、农村残疾青年进行精准的用户画像分析, 精准匹配其劳动力特点和地域分布。在全日制职业教育阶段, 实施定向招收、专项奖助学金支持以及“百分之百安置阳光就业通道”, 确保困难家庭子女能够通过高质量职业教育获得稳定、体面的县域核心产业岗位, 实现“一人高质量就业, 全家彻底脱贫”的根本治本效果。在社会技能培训阶段, 量身创设定向“岗位适应性短期技能课程”, 联合人社部门将培训直接与县域产业开发区、美丽乡村公益岗位、本地家庭服务业和社区物流中心进行定向劳动力输送对接。通过法律制度、专项财政拨付和信息精准交互的有力合围, 建立起一整套具有强烈人文温度与高度法治保障的相对贫困防范和治理体系, 筑牢乡村全面振兴的民生制度防线。

6. 结论

综上所述, 生成式数字化变革与新质生产力突飞猛进的算法时代, 区域职业教育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度融合, 绝非简单的劳务输出或粗放的技术扫盲, 而是一场涵盖空间重构、要素激活与多元共生治理的深层次制度变革。在这场变革中, 传统的教育边界、空间区隔和治理逻辑正在被全面解构。唯有通过对人才供给要素、社会空间重构以及数字技术的深度重组, 职业教育才能在根本上化解结构性脱节、协同动力不足和空间割裂等现实症结, 真正担负起乡村振兴突破口和要素活化纽带的时代重任。未来, 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治理重塑与发展路径, 绝非消极地打补丁或采取偏颇的单边倾斜, 而是应当通过“三区融合”和“一体两翼”的空间重构, 将优质的教育与产业资源精准、高能、无形地嵌套在乡村的发展网络之中; 通过“多主体互利共赢”的法治化契约机制与科学的“大地考评体系”, 彻底激活学校、企业、社会与村民的内生协同动力, 最终建立起一个平衡、高效、兼具技术先进性与人文温度的“共生式数字社会治理闭环”。

作为兼具独特生态优势与活跃县域经济特色的浙江衢州, 已在产教精准对接、数字化开放教育、创业青年长效培育、教育长效阻断相对贫困等领域开展了深度探索。这一探索不仅充分释放了区域大模型自主创新、数字化服务与乡村实体产业融合发展的巨大红利, 更将在我国二十一世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探索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宏大布局中, 贡献一套蕴含乡土协同共治治理逻辑的区域治理跨越路径, 充分彰显区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制度创新的实践价值。

基金项目

2025 年度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科研项目(编号: C06)。

参考文献

- [1] 陶军明, 袁小红, 刘萍.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治理相对贫困: 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6(5): 32-40+70.
- [2] 朱德全. 人才振兴: 职业教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突破口[J]. 教育与职业, 2026(2): 14.
- [3] 张翼. 职业教育助力乡村人才振兴战略实施[J].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6, 25(1): 104-107.
- [4] 王丽英, 宋俊成. 职业教育新质人才培养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J]. 中国成人教育, 2026(5): 65-72.
- [5] 邢苏. 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阿坝师范学院学报, 2026, 43(1): 35-40.
- [6] 姜涛. 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服务县域经济的精准对接机制研究——以牡丹江地区职业教育为例[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26, 35(1): 67-75.

-
- [7] 林津晶, 刘倩. 思政教育驱动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策略探索[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6, 39(9): 99-101.
 - [8] 秦伟, 胡雷. 共生理论视域下职业教育赋能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研究[J]. 教育与职业, 2026(2): 58-64.
 - [9] 覃发兵, 张志, 首玲莉, 黄铭舒, 胡晓熙. 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赋能农村创业青年培育的长效机制构建[J]. 职业技术, 2026, 25(5): 19-26.
 - [10] 周颀. 乡村振兴视域下湖北新商科职业教育转型发展路径研究[J].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6, 25(1): 61-66.
 - [11] 吴明霞.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多维转向、问题审思与未来图景[J]. 云南开放大学学报, 2026, 28(1): 50-56.
 - [12] 何园园.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地方乡村振兴助力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26, 29(3): 111-116.
 - [13] 江林枫. 空间重构与资源整合: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治理机制研究[J]. 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学报, 2026, 35(2): 11-18.
 - [14] 蒋振杰. 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制及实践探索[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26, 42(1): 85-87.
 - [15] 常雪萍, 刘任重.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J]. 成人教育, 2026, 46(3): 69-76.
 - [16] 《数字经济时代一体两翼开放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探析》评介[J].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26, 35(2): F0003-F0003.